

容观瓊 著

文化人类学与 南方少数民族



西人民出版社

自序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学术界要求发展文化人类学的愿望提出来了。有的学者指出：“人类理解最不充分的却正是人自身。”我们的国家“有必要大力发展”“人类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所重视的文化人类学）。”^①一位史学家更率直陈言：“有些国家视这门学科为决策学科，制定社会发展规划常吸收文化人类学家参加。”反观我国，文化人类学“积贫积弱”，“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在前一段中国文化研究中，“唯独听不到文化人类学家的声音。”“马克思恩格斯用自己的实践告诉我们，应当对文化人类学持什么态度，冷落这门学科的时代应当结束了。”^②

“人类学给人提供了一面大镜子，让他在不同的方面观察自己。”这是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说的。人类学，主要是文化人类学，是一门以研究人类自身的文化为己任的开放性边缘学科。它对大千世界不同类型的文化不仅作出记录和描述，而且更重要的是进行历史的和比较的分析，明瞭各种文化之间的基本结构和整体特质，并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去探求人类行为的状态和变化规

①范岱年：《关于数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若干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编：《论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4—36页。

②黎澍：《为什么要研究人类文化学——〈中华文化辞典·前言〉》，载《广州日报》1987年8月13日第七版。

律。与偏重于人类某一特殊层面的其他社会科学稍有不同，文化人类学工作者是在更为广阔视野的基础上去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过去的原始部落文化、乡村社区群体到当代的城市、工业社会——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上提示过，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人类历史时，“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因此，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上，第一，要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放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加以考察，强调一切的社会文化现象必须依据它们所在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理解和阐释，即用整体论的观点去考察社会文化系统内部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进而借用多学科的成果，开展整体的综合的研究。第二，提倡跨文化比较研究，即利用世界不同文化或民族志资料作比较来检验有关人类行为的假说，努力找出不同文化的特点及其文化模式。任何有关建设性的概括都要建立在跨文化检验的基础上。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应当知道，对某一项研究作理论判断时，以一个族体为例与以全世界的更多族体为例是颇有区别的。这种跨文化的比较方法，对于研究处在同一历史阶段的族体与世界范围的其他族体对某一具体事物或文化现象的看法，至少可以帮助我们通过民族志类比分析，作出动态的了解，以便求得接近实际的结论。第三，文化主位研究 (Emic Approach) 和文化客位研究 (Etic Approach)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方式。前者是指从被研究者的立场、主角的地位去了解和研究问题；后者则是站在研究者的立场、旁观者的地位去了解和研究问题。文化人类学工作者主张文化主位研究的方法，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去取得第一手的调查材料。因为，要了解社会文化现象必须避免自我文化中心的偏见，入乡随俗地把自己置身于被研究者的环境之中，否则，“观察者在—一个陌生的文化模式中只能看到若干要素”，而且“很容易受自己的文化影响而产生错误的看法，就是以自己的文化法则来解

说这些要素之间的意义。”^①

在国外，文化人类学知识已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宗教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学科领域；有些有关社区经济和文化发展战略项目，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参与研究的也不少。我们的情况怎样呢？据我所知，近年来，文化人类学学科研究比不上文学艺术和史学领域来得重视。^②别的不说，对于在颇大程度上亟需借助文化人类学知识的我国南方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远没有得到更多的单位和学者们的理解和支持。以广东为例，在它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早期有“蛮夷”文化沉积，随后又受南下的汉族及其他族体程度不同的影响；与此同时，又与东南亚太平洋岛屿存在文化交流关系，加上广大地区生态环境的差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等。所有这些，就形成了多层次、多结构的地区性文化特点，以往治南方民族史者，一般满足于以有限的文献史料和考古实物为主的静态描述，不习惯进行动态的结构功能分析。有的人研究问题时，头脑里没有树立整体的综合的观点，甚至怕沾上文化“南来说”的边，矢口否认南来的文化因素。历史上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从来是双向的。像海南岛的黎族，它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古越族为主体，既同化了不少来自北方，通过从军、谪流或迁徙到岛上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成份的成员，又吸引了一部分南来的文化和种族成分，这是人类学综合材料验证了的。又如广东省境内西江流域广大地区，过去是少数民族的天下。仅就明清时期而论，这一带由于生态环境、土官制度、民族战争和教育措施等多种因素，共同促发

①转引自R.M.基辛著、于嘉云等译：《当代文化人类学》，下册，台北巨流1981年版，744—745页。

②值得指出的是，除了浙江、上海、北京、辽宁和陕西等省市出版社陆续出版有关译作介绍外，学者们着力介绍这一学科的观点和方法运用于史学和文学艺术方面的文章比较多。具体内容，恕不列举。

了民族文化的变化。其表现特点是整个地区的变化和局部地区民族文化的残存。这种多层次、多结构的文化背景，只有用文化人类学有关文化变迁的观点，通过实地参与调查才能掌握和梳理出来。

我们始终认为，在探索改革开放战略措施时，重视经济发展是正确的，但是，各自不同的社会条件——诸如起作用的历史文化的各种机制——也要加倍注意。当然，没有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等于海市蜃楼；反过来，没有相应的社会条件，没有同时进行的社会文化改造，经济发展也不能深入和持久。上面提到西江流域的历史实际，今天实施该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战略，如果不正视这样的文化背景材料，不仅仅影响其发展速度，而且很可能成为消极的阻力。

我们正走向世界，世界也正走向我们。当前，我们要有开放意识，要有忧患意识，要有科学精神，加倍重视包括文化人类学学科在内的建设。这本名为《文化人类学与南方民族文化》共收录了我近年来的习作二十三篇。就内容而言，并不都是针对南方地区民族文化而发的，但是，从总的意向说，我的初衷是想回答文化人类学知识如何应用于民族文化史、比较文化以及投入现代化建设等问题上。抛砖可以引玉。如果有更多的中青年学者参与开拓这块从不同的方面去观察自己、解剖自己的园地，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容观琼

1988年国庆前夕于中山大学



作者近照

目 录

自序.....	(1)
我对人类学研究的一些认识.....	(1)
略论我国文化人类学的应用研究.....	(8)
教学实践给我们提出的课题.....	(20)
人类学在民族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27)
文化人类学知识与考古学研究.....	(33)
值得提倡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	
——“民族考古学”介绍.....	(49)
关于民族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	(64)
科学研究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	
——评《论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一文.....	(75)
从当代科学发展趋势所想到的一些问题.....	(88)
竞渡传风俗	
——古代越族文化史片断.....	(94)
我国古代屈肢葬俗研究	(100)
从民族志资料看古代二次葬俗的渊源	(119)
试谈长沙马王堆一号、二号汉墓的族属问题	(143)
释新石器时代的“割体葬仪”	(155)
关于我国南方棉纺织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	(161)
释“岛夷卉服，厥篚织贝”	
——兼谈南方少数民族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贡献 ...	(169)

我国棉纺织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黎族棉纺织工艺

——《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卷读后 (178)

历史上黎汉民族团结友谊的光辉篇章

——记我国著名女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

向黎族人民学习棉纺织技术的事迹 (183)

瑶族与古越族的关系

——从《评皇券牒》看瑶族的早期历史 (195)

瑶族历史三题 (205)

广东畲族族源问题管见 (215)

唐代广东民族文化初析 (221)

王平公社黎族人口现状的初步分析 (227)

后 记 (232)

我对人类学研究的一些认识

这次参加国家教委委托陈国强教授主编的《人类学概论》提纲及部分书稿讨论会，获益良多。

经过几天的讨论，我总的感受是：根据三个面向的要求，我国人类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本本上了。事实上，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已为我国人类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个决议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作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刻的论述，特别是强调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创造的观点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它指出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要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收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前一代人积累下来的知识量成比例的，作为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的人类学也是如此。目前，就文化人类学说来，许多研究群体的文化及文化变迁的课题，都是运用整体的、综合的观点，科际的、比较的方法去完成的。我认为，认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第一、人类学强调整体的综合的观点，科际的、比较的方法是与当代科学发展的趋势相一致的。

国外不少人类学家把整体论Holism、整体研究Holistic Approach 视为是人类学学科的标志，是这门学科有关研究方法的一种理论。这是有道理的。什么是整体论？一句话，就是把自己研究的对象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观点。文化人类学工作者所研究的对象——社会(群体)及其文化——都是有组织的、有结构

的一个整体。它不同于单纯的自然界中的系统，不仅是一个有形的、物质的和技术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包含有人的活动和社会心理文化因素的社会系统。这样的社会系统，自然由相互依存的各个部分或诸种因素所构成，其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或诸种因素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每一部分或某一因素的变化都会对其他部分或因素产生影响和效应。尽管说，为了分析或论证的目的，可以分解系统中的部分或因素，但我们始终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关系。象经济制度、政治组织、亲属关系、婚姻教育、宗教信仰等等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成为各该社会文化系统的网络的组成部分。与其他社会科学稍为不同，人类学工作者是在更为广阔视野的基础上去研究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所以，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美国人类学家 A. L. 克鲁伯和 C. 克拉克洪两人明确地指出：“当代人类学理论最伟大的成就，可以说是增强对文化的整体性认识，不再是只看到一个个个人工制品、语言字汇和一堆分析到最小单位的文化特质”了。有的学者甚至说：“对于人类学家来讲，了解一个文化的整体，比知道所有错综复杂的细节更为重要。”

但是，说怪不怪，在我国人类学界，极个别的人在分析批判西方哲学“整体论”时曾经发表过如下的错误断言：“所谓 holistic view（‘整体观’法），不过是将某些局部情况拼凑在一起而构成其为‘整体’，他的面貌和内容便是这样。”（见《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一期，页145。）谁都懂得，亚里士多德的“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的论点，至今仍然是基本的系统问题的一种表述。整体并不等于部分的简单总和，各部分如果离开整体是不能存在的。社会（群体）及其文化同人类的躯体一样，都是有机的整体，它不同于机器可以拆卸，也可以重新装配，如果把它拆卸下来，它的生命就终结了。人的四肢和各种器官存在于人这一统一体中，只有在解剖学家手

下才变成了单纯的部分，正如恩格斯讲的，这时解剖学家所处理的“已不是活的躯体，而是尸体”了。（《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页314注159）基于这一道理，当我们研究某一社会（群体）及其具体文化现象时不能不注意到研究对象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的机制，看到各个侧面、各个层次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那就要加强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而每一个人类学工作者尤其需要努力学习和掌握有关学科所能提供的信息，踏实地去研究既定的课题，使我们的认识接近于客观实际。象民族历史上的问题，谁也不敢说，仅仅依靠过去史书的记载说能完满地解决了？事实上，我们已经发现，有些研究课题，只懂得某一群体的体质成份，却不知道其文化特点；只引用某一侧面的材料作“新证”却忽视了另一侧面的材料所提供的事实，其结果是不可能令人满意的。

第二、重视科际的、比较的研究方法。

一般说来，对人类文化的研究，既要看到文化的发展有着继承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各民族文化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一面。前者属于文化史的范围，后者则归入比较文化的范围。对于文化史、文化比较研究，当然不是人类学工作者所专利的课题，但是人类学专业工作者重视文化的起源及其发展，并从中理出规律性的东西却是通过比较方法来实现，运用这一方法也是很早的。

翻开人类学发展史，我们就不难发现，从早期进化论开始，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去处理各地区群体之间的文化的异同性了。早期进化论者运用比较法，即利用现存的部落作为早期阶段的例子来建立社会进化的普通法则的。像英国考古学家拉布克早期在1865著《史前时期》一书，就以地质学的实例用类比的方法去解说史前时期的历史面貌。他说：“假如我们打算清楚地明了欧洲遗物古迹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拿迄今仍然

存在的、被世界其他地区的野蛮种族所使用的原始工具和武器加以比较。事实上，塔斯马尼亚人和南美洲的土著居民之文物考古工作者，与负鼠和树獭之于地质学家一样重要。”另一位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认为，对文化现象进行分类排比之后，每一类别间的实物资料通过比较，就会展现其进步或演化发展的模式。类似的石器、编篮和烹调等文化现象在不同大陆和不同社会之间，不过在细节上有所差异而已。大家也知道，即使是资产阶级学者都一致赞赏美国著名民族学家摩尔根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并认为人类行为科学只用单一文化分析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人类学重视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它着力的不是一个孤单的社会甚或一种社会习俗方面，而是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即不限时空地对群体与群体之间、传统与传统之间作出比较，做到普遍化（一体化），进而达到识别文化的异同及其所以异同的目的。它寻求社会结构上之所以变异的科学解说，同时又要证明人类群体本身及其习俗的来源和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的加强，这种科际的、比较的方法在很多学科领域盛行了。著名科学家贝弗里奇指出：“富有成果的研究路线，往往出现于学科分支的交叉点上。”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在各门学科的接触点上，可期望得到最大的结果。”像语言学民族学相结合产生的语言民族学这一分支研究可以提供可靠的科学信息。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往往蕴藏在各该民族的语言词汇之中。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就采用许多语言材料类比地论证民族学上的问题。他的比较方法是建立在历史本身有它的延续性这一信念之上的。他特别注意从词汇上去探索各民族的文化表现，紧紧抓住亲属称谓的特点，从中窥见古代家族的构成和早已失去的婚姻制度。同样，考古学的分支研究——民族考古学所能解答的问题也远不是考古学这一单一学科所能圆满解决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原则，

以考古发现为对象，通过民族志资料，结合历史文献，研究考古实物的内涵，即从研究一个近现代落后的民族部落的行为去推断文化遗存，运用以今论古，以今证古的民族志类比较分析法，见物又见人，又见到社会作出合乎历史实际的解释。谁也不会否认，当今不少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是运用这种多学科结合的比较方法探究出来的。

第三，实地调查研究是我们这一专业学科的基本功。

文化人类学主要特色之一就是深入现场，进行直接的观察和访问。这种工作方法，西方人类学界称之为参与观察法和深入访谈。它是在主动避免“自我文化中心”的偏见的基础上，置身于某一地区（群体）的文化环境之中，通过“三同”生活，既看到其文化不具形式的方面，又注意其文化的公开的一面，即留心常态的社会现象，又不放弃变态的社会现象，努力取得反映各该地区（群体）的现状和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在外国，把这种田野工作作为训练学生的重要途径。通过工作实践不但可以巩固提高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甚至看到自己的弱点，看到自己所攻读的专业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开展综合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感。

其实，我国不少的学者，根据个人的亲身见新著书立说早就被世人所称誉了。有人已经指出来了：我国古人不懂得民族学，却知道用民族学的方法写书，知道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事件是最值得记录下来第一手材料。远的不说，比如两广地区，从唐宋以来著录这一地区少数民族民情风习的书籍，就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实践出真知。文化人类学是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础上的学科，如果离开了实地调查研究，它就没有生命力。同学们当你们经过一次、两次甚至多次的工作实践之后，就会知道我说的话是真实的。

下去的时间尽可能充裕一些，以下马“三同”去取代一般的“走马看花”。这样，从自己亲身的体验中了解当地生产、生活的全过程。特别是红白喜事，通过各式各样的仪式和活动，展示毫无拘束的“表演”，尽收眼底。举一个例子说，解放时，在海南岛乐东县的一些黎族村庄，妇女虽然不纹面了，但在她出嫁那天，还要在脸上象征性划上两条直线，有的则在结婚拜祖先时，新娘要藏一块墨（或木炭）在裤带里边。很明显，这种在现实生活中消失的纹身习俗却残留在婚嫁仪式之中。这就是英国人类学家E. B. 泰勒所说 Survival 的具体体现。在所有的社会里，残余下来的古代思想和行为模式可以作为明了以往文化发展阶段因素的“证据和实例”。可以这么说，凡见到象征形式，可以推想用这种象征形式的民族，在过去生活中实有其事。

道理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是，眼前，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被中外学者批评过的“坐在沙发椅上的人类学家”。他们怕艰苦的田野生活，总是利用别人的调查资料做自己的案头工作，我认为，年青时候争取下去，多接触实际；到了年老，想下去就有困难了。俗话说：“成如容易最艰辛”。一切真正想要有所成就的人，都不会害怕深入现场、体验生活、调查研究这种艰辛的。

最后，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的，在与到访的国外同行学者交流中，如果不解决共同语言问题，这种交流是不起作用的，有的简直是浪费时间。所谓“共同语言”指的是在自己专业领域包括具体名词概念在内的现代多种科学知识。在交流座谈活动中，既听不懂对方发言的含义，又不能用对方所懂得的形式作出自己的回答，更说不上用对方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意见，这叫做没有“共同语言”。这样的场面，其效果是可以想像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国外民族学界，随着研究的深入，早就把亲

能属制度类归成六种图式了，而我们的一些学者至今还在摩尔根《古代社会》所讲的图式里兜圈子；又如在家结构上，在国外已用核心家庭、复合家庭取代以往的“小家庭”、“大家庭”了，而我们一些学者仍讲大家庭、小家庭。这种近乎自我“封闭”的做法，怎能谈三个面向呢？

人类学是一门知识比较密集的综合边缘学科，它不仅同其他社会科学有广泛的联系，而且同自然科学也有密切的联系。希望同学们在广博的基础上求精，扎扎实实地学习掌握好基础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进一步思考如何为当前四化服务。我国人类学的完善和发展寄希望于你们这一代！

略论我国文化人类学的应用研究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①在当前我国两个文明建设中，文化人类学如何体现它是作为一种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当代的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已经把自己的研究目标，从以往的一些小规模社会或部落社会走上复杂的城市和工业社会上来。他们已经察觉到许许多多的人类现实问题，包括行为、态度、制度、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变化，以及对于文化现象中的涵化（acculturation）、濡化（enculturation）或同化（assimilation）的研究，都与文化人类学的应用分不开。要改善和增进人际关系，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必须把这些问题放在一定的文化传统制约下予以考虑，并在了解具有不同模式的各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特质的基础上进行。因为任何社会群体及其文化都是一个有组织、有结构的整体，它不同于单纯自然界中的系统，不仅是一个有形的物质的和技术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包含着人的活动和社会心理文化因素的社会系统。这样的社会系统自然由相互依存的各个组成部分或诸种因素所组成，每一部分或某一因素的变化都会对其他部分或因素产生影响和效应。所以说，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在提供某一研究课题有关社会群体文化特质（文化背景材料）时，不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一版，页375。

不注意到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民族）内部联系，各该群体的各种文化机制。

我始终认为，我们的应用研究应该建立在现代科学和适应我国国情的牢靠的基础之上，对于外国的东西，其中有不少的分支研究是值得借鉴和开展的。

一、深入研究改革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前四化建设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重视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重视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因势利导，移风易俗，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文化人类学的中心任务是研究我国各民族文化的起源、发展及其异同的特点，为增进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团结、进步和繁荣服务。因此，它同样肩负着发扬各民族人民的优秀文化传统，分担起本学科为四化建设提供国情，文化背景材料的研究任务。

摆在我们面前，首先考虑的问题是改革与传统文化的关系。①

恩格斯说过，在人们自己创造历史时所遇到的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②在我国，改革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改革本身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群众性的探索和创新的事业。我国的改革浪潮正在冲击着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经济关系和僵化过时的

①参阅潘维明：《改革是一个艰苦的学习过程》，载上海《解放日报》1985年5月4日第四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页477—478。